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SanYu CongGao Wo Yu ZhongGuo XianDaiShi

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上）

王桧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

丛书



SanYu CongGao Wo Yu ZhongGuo XianDaiShi

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上)

王桧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王桧林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8049-3

I. ①三…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741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邮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230 mm
印 张:46.25
字 数:72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58.00 元

策划编辑:刘松波
美术编辑:王齐云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编辑:赵雯婧 曹欣欣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印制: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4年3月

代序 我与中国现代史

王桧林

我1925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42年乐亭进修中学初中毕业，1945年河北高中(当时叫北京市立高中)毕业，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抗日战争史的教学和研究。

我出生在农村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父亲读了两年半私塾，就“闯关东”到黑龙江省一个小村镇当学徒去了。后来家庭经济情况好转，我的两个哥哥都读了六七年书，在农村算是文化程度高的了。我的故乡乐亭县农村，皮影戏、大鼓书很流行。演皮影戏叫“唱影”，一些男性农民能哼哼几句戏词。我的两个哥哥喜欢唱戏，家里有一些皮影戏剧本(叫做“影卷”)，如《二度梅》《龙兴传》等，还有些民间流行的小说，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镜花缘》《聊斋志异图咏》等，还有不少我哥哥他们念过的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释义》等。我小时候体弱好静，不爱出去玩，上了学认了字之后，就经常在家里看这些书。除了从课堂上获得知识之外，许多知识是从这些书上得到的。书上的许多东西是不懂的，但也记住了不少，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云淡风轻近午天”之类的诗句；“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之类的历史知识；“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等文句，就是这时记下来的。

我在进修中学读初中时，校长葛庆惠(字东侨)是清朝葛翰林的儿子，他读过许多古书。他提倡学生自愿在课外背诵古文。学生把一篇文章背会之后，就去他面前背诵。这样日积月累，我背会了三四十篇古文和长诗，其中有《谏逐客书》《过秦论》《前出师表》《陈情表》《兰亭集序》《吊古战场文》《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岳阳楼记》《前赤壁赋》《长恨歌》《琵琶行》

《兵车行》《丽人行》等。

河北高中是一所全国知名的老学校，这里不仅师资力量强，图书馆藏书也很多。我在高中学习的后半，理科的课没好好学，总是去图书馆借阅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看，自然科学方面只爱宇宙论那一类的书。今天还记得起名字的书有：瞿世英译《西洋哲学史》、陈翊林的《社会学概论》、罗素的《社会结构学》（中译本）、潘汉年的《文学概论》、鲁迅译《出了象牙塔》、高一涵的《政治学概论》、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谈美》、俞平伯的《读词偶得》、钱穆的《国学概论》等。为了学英文，买了英文本汉文注释的《安徒生童话集》，《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这里读到的。这种学习有得有失，好的方面是养成了求知的兴趣，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锻炼了思维能力，特别是理论思维能力；不好的方面是放弃了自然科学的学习，至今对此所知太少。

大概从1942年、1943年起，乐亭县城和大清河是日军的据点，离县城较远的海边一带成了解放区，其他大部分地区成了游击区。我在家乡了解放区油印的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的绪论，由此知道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生产力、生产关系这类概念。我还记得曾经认真想过“存在决定意识”是怎么回事，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时开始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乐亭，在夏庄毛庄小学教书。校长有一本关于心理学的书，我看了。特别记得的是当时还看到了一本手抄的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以前我虽然看过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但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说法，看了之后觉得耳目一新，收益很大。

1948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一两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在校内时时听到炮声和机枪声。入校后我们组织了进步社团滚滚流社，在进步学生自己办的小图书馆——行知图书馆当义务管理员。解放军围城以后，同班同学黄祖武向我传达党组织的指示，要我参加护校活动，每天夜晚在校内院子里暗中巡逻，防止国民党政府撤走时有人搞破坏。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平解放以后，我经常搞政治活动、参加政治运动，直到1952年毕业。在这期间，我虽是很用功的学生，读的书

也不多。

那时白寿彝先生主编《光明日报》副刊《历史教学》，他鼓励班上的同学写文章投稿，我写了一篇《墨子》，在该刊上发表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时最受我班同学欢迎的课有白寿彝先生讲的中国通史隋唐部分和王真先生等（当时王先生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讲的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外庐先生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他给我们班开了一门课（忘了课程表上的名称），讲解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原著。我有很多地方不懂，但还是认真地读了列宁那本书。以后我学习侯先生，带领研究生逐章逐节逐段地阅读讨论《国家与革命》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作为政治理论课来学习。

大学毕业以后，我留在历史系任助教。上学时我本来对中国古代史有兴趣，写过一份长篇作业《宋元土地制度》，老师吴宏中先生给了高分。留校时系党政领导分配我教中国现代史，我欣然接受了。工作的第一年没有做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事，系主任白寿彝先生带领我们六位青年助教教全校的中国通史（学校一度规定全校一年级学生都学一年中国通史）。白先生培养我们这一批人的办法很好：他自己先拟好整个中国通史课的教学大纲，根据课程进度先让我们按章节各人写一份草稿，他采用各份稿子中写得较好的部分，整理综合起来，写成一份正式讲稿，然后我们每个人按白先生写成的讲稿到课堂上去讲。其实这份写成的讲稿主要是白先生自己的东西。这种做法对培养青年教师是很好的。教了这一年的课使我对中国通史有了进一步的更系统的了解，加深了历史知识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配备专人搞中国现代史，这在国内可能是最早的，当时全国各大学历史系都没开设过这门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过去也没有人搞过这门学科的研究。我搞中国现代史没人指导，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到政治教育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去，跟着王真先生学习。这时王真先生已由中宣部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我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参加青年教师们的中国革命史的集体备课和部分教学工作。其余时间就是为教中国现代史做准备。为了让我尽快掌握1919年

至1949年这段历史的内容，王先生把他的全部讲稿都交给了我。那里边有王先生手写的稿子和抄录的材料，有从报刊上剪下来的文章和资料。王先生讲这门课的家底全在这里了。限于当时的条件，王先生的讲稿主要是革命史。我根据王先生的讲稿，补充了一些通史方面的资料，整理成一份比较系统的讲稿。我根据这份讲稿开了中国现代史这门课。中国社会上有这样的事情：做手工艺或教武术的师父，往往把最紧要的一招儿留下来，不教给徒弟，免得徒弟超过自己。当教师的未必没有这种人。但王先生没有私心，人格高尚，使我一生感激不尽！我能顺利地渡过中国现代史教学这一关，和王先生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1956年王先生从政教系调到历史系，教中国现代史。这时历史系教中国现代史的有四个人，成立了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王先生当主任。这是我国高校成立较早的一个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这个教研室不仅担负起本系中国现代史教学任务，还为西北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郑州大学、辽宁大学、南充师范学院等校培养中国现代史教师。

195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山东大学历史系孙思白教授来见王真先生，商谈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当时还没有确定这个名称）的事。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当时高等教育部为了高等学校历史系教学的需要，组织人编写中国现代史（1919—1949），由中国人民大学李新教授主持，孙先生带领几个青年教师来北京，参加了这项工作。他这次是来和王先生商量是否参加这项工作的。王先生同意了。于是他带领王文瑞、任翰（当时是西北师院的进修教师，后来调到郑州大学）和我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承担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全书的第三卷）的编写。王文瑞写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部分，任翰写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部分，我写国民党统治区和文化思想部分。王先生总其成，并作为全书的主编人之一。由王先生带头承担抗日战争史的撰写任务，对我系开展历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我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开始。

为了写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通史，由王先生亲自指导，拟定纲目，组织青年教师（包括来此进修的教师），分门别类从各种报刊上收集抄录原始资料，经整理成册，共20余册，作为写书的重要依据。写作此书时利用

了那时很难见到的《六大以来》上的资料(据说只有中央委员才有此书,这书是李新从吴玉章那里借来的)。这些工作使得编写质量得到了保证。在王先生亲自动手和直接指导之下,大家齐心协力日夜撰写,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全部书稿基本完成,约30万字。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较早的一项科研成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抗日战争时期卷》开始写作后不久,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全国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工作被打乱或被迫停止。此书的写作受到极大干扰,但幸而未中断,到1961年10月正式出版。

1958年和1959年的“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全国若干地区出现了大饥荒,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大跃进”被迫停止,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得以恢复。这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学习年限由四年改为五年,在五年级开设“专门组课”。历史系领导决定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开抗日战争史专门组课,由三个人承担,我分担三分之一,讲四个专题: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二是中国国民党的抗战主张,三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四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在撰写讲稿过程中看了不少有关的原始材料。

此后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校系领导要我参加北京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去就是一年半,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全停了。1964年冬,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的试点开展学校社教运动。我的专门组课讲稿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当时我在通县搞社教工作还没结束,学校“四清”工作队两次三番派人到通县去,叫我回校接受批判。1965年5月回校后,对我进行批判的大会小会不知开了多少次。批判的“罪名”是我的讲稿“反毛泽东思想”“吹捧蒋介石”“诬蔑了党的光辉形象”等。这些纯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既然搞政治运动,总得找出重点批判对象,不然为什么搞政治运动呢?1965年冬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四清”运动被更高的阶级斗争形式“文化大革命”取代了。

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1978年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校中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能够正常进行了。

前进中的障碍虽然还不少，但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相比是极大地不同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从1973年起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恢复部分的教学工作，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师带着学生到正在施工中的东方红炼油厂边劳动边上课。因为过去的教材被认为已不适用，我们在干活儿、上课的同时开始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我拟了一份编写大纲，交给学生和教师一起讨论。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两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对立”，有的教师和学生认为把两个政权并列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那时“左”的观点是随时可见的。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经教研室同仁的共同努力，新教材编出来了，1980年3月铅印出版，内部发行。经过较大的修改，1983年《中国现代史》上下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到现在这部教材已发行20余万套，仍是使用最广的一部大学历史系教材，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文科优秀教材二等奖。这部教材今天仍在广泛使用，有以下的原因：第一，在资料的使用、论断、文句表述方面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公允；第二，在全书体系架构方面更符合中国现代通史的要求，力求摆正国共两党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其他有关中国现代史的书一般是按中共党史的体系写的，此书内容相对更加全面；第三，注意历史发展脉络的贯通。不过不足之处仍是很多的。《中国现代史》的框架结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奠定的，《中国现代史》更完备了一些。

从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这十年间，抗日战争史研究，主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成为中国史学界研究的热门。适应这种形势，我和侯样祥（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江淳（当时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了一套大型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到1995年这套丛书已出版了30种、1000余万字。后来陆续出版，达到50余种。这套丛书包括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各项专门史研究的总汇。

从1980年起，我和李慎兆与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的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同志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我们参加了大纲的制定，撰写了其中的第五章、第七章。我参加了全书的

修改定稿。此书于1984年6月出版。这部书不完善之处很多，但它是第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从1982年起我参加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的主编和撰写。该书于1990年出版。由郭大钧、鲁振祥和我分头撰写、由我对全稿进行了构思和审校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白寿彝先生主编）于1987年出版。此书还出版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译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我认为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开设这样一门课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早已开始了这项研究，准备开课和写出一本专著，并拟定了详细的撰著大纲，但是工作进行得很缓慢，《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这本专著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从1987年起，我参加了由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第十二卷的编著工作，经过十余年时断时续的编撰，此书于1999年3月出版。我除了策划、拟定编著大纲、组稿、审稿以外，撰写了其中的综述部分，对这30年历史的发展演变做了综合的系统的论述。

以上是我这些年在中国现代史研究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从1957年至1977年中国的思想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左”的教条主义。我因为有爱看各种杂书和爱思考的习惯，接受正确的理论一般也要通过自己的理解，教条主义比较少一点，因此，在政治运动中常常受到批判。被批判的东西固然有政治的，但更多的是学术思想上的，这是我的被批判与众不同之处。上面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使我重新认识现实，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不是对过去的认识一概否定，而是按不同的情况对过去的认识作肯定、修正或否定。这使我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久前绝对不可动摇的“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弃置，经济上改革开放的进行，为人们思想解放提供了实际的例证。这时思想桎梏虽然仍然存在，但思想界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这是思想创新、学术发展的前提。

要想遇到问题不为陈旧的教条所限，能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尽自己的力量推进科学的发展，就需要掌握一定的原理原则去应对随时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因此我认为要解放思想必须树立几个基本观念。1993年11月我在中国现代史学会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解放思想需要树立的五个基本观念。五个观念如下：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以外，承认其他社会科学、哲学学说（称得起学说的学说）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它们也是人类社会中极复杂的事物的一种真实的反映，是一种局部的真理。这样，我们就能够打破思想上的自我封闭状态，吸收人类社会中一切有益的思想成果，使我们视野更开阔，思维更活跃”。第二，“‘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实践论》）人们的思想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的。从学术发展史上看，任何一种学说都是不完备的，都是随时代发展的。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对宇宙总体及其中的一切事物、一个事物的全部内涵，作出全面的、无微不至的反映；并且事物本身及其内涵又是不断发展的。所以，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不能包容一切真理，都是不能穷尽一切真理的。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第三，“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不断根据新的事实检验、审查已有的结论、原理、原则、理论”。“我们的理论研究者，要有时代感，要随时代前进而前进，根据现实检验理论，根据现实修正理论，根据现实发展理论，根据现实创造理论，使我们的思想永不僵化，永远富有青春活力。”第四，“敌对阶级之间在精神文化上是可以继承的，当然这种继承不可能是全盘的”。“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有一句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第五，“‘相灭相生’、‘相反相成’是学术思想发展的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多

种思想、多种学说，是无法排除的合理现象。它们之间有的相克相灭，有的相生相长、互促互补，而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相生’‘相成’的机缘，‘相生’‘相成’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看待学术问题，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大大地丰富起来”。（以上引文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毛泽东邓小平与现代中国》，345～355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推进学术和思想理论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重大课题，2000多年前中国的伟大思想家荀子就写了《解蔽》这篇专题论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中国学术（史学当然包括在内）的发展创新，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是一门内容非常繁复、人类社会的一切无所不包的学问，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去研究。历史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它的演变发展是连续不断的，但发展过程有中断，又是有阶段之分的。既然有阶段之分，就一定是前后的历史有所不同；有所不同，才有阶段的划分。因此史学家进行历史分期时，注意的往往是划分阶段前后的历史的不同之处。但是前一阶段的历史和后一阶段的历史又是紧密联结着的，后一阶段是由前一阶段演变而来的。划分历史阶段又往往以一个重大事件为划分的标志，而这个重大事件既承前又启后，它又是上下段历史联结的关节点。我们的史学界对历史分期问题普遍有所关注，而对上下两个阶段的联结，特别是作为联结上下两个阶段的关节点则较少注意。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力图在历史研究中有所体现。例如，抗日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反帝斗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复兴时期（实际上复兴没有实现而是为复兴创造了条件）。这个复兴问题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各卷作者座谈会上开始提出来，以后在各种场合不断有所阐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换的转折点。孙中山“容共”使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全国性的革命领导工作，这是民主革命派不能单独领导革命而要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表现。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开启了中国要求革命和民主进步的政派和人士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和总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是中国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从1935年冬中共瓦窑堡

会议、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七七事变”爆发是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过渡时期。从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到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协议，我把它叫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短暂的特殊阶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解决了中日两国的矛盾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各派政治势力民主协商共同建国的时机，并且达成了协议，这是中国近代史从未有过的事情。可惜的是这个从未有过的良好时机很快就被中国近代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取代了，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和平民主发展的机会。这些问题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中力图有所体现。

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只有材料的疏理、史实的编排还不够，还要透过具体事件发现内在蕴含的东西，这就需要分析、概括、综合、由表及里，透过史实的表象掌握根本性的东西。我在历史研究中比较注意在这方面下功夫。例如，我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派政治力量消长演变的基本过程，总结为“二分变三分，三分归一统”；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概括为“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把抗日战争时的中国总格局概括为“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一书中，除了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以外，还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五个基本问题（这也是思想史发展的一般性问题）：一、理论的发展决定于现实的要求——理论发展的必要性与选择性；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理论对实践的巨大作用；三、普遍性原理与国家特点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四、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正确理论是战胜错误理论的武器；五、批判、包容、吸收、取代——“相灭相生”思想发展规律的体现。以上这些是我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其生命力在于破旧立新，推陈出新，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当然新观点、新结论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史实论证上，为沽名钓誉而肆意去创新，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创不了新的。我在自己的史学工作中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国现代史是由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扩展而来，它从后者中接受了很多必需的东西，也受后者的极大局限，因此我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问题。“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机

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曾经是一种定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所谓“二次革命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把“二次革命论”说成错误理论是瞿秋白、蔡和森等用“一次革命论”批判陈独秀所形成的一种说法。中国现代史有这样一种提法：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集团既不是敌人又不属于人民。我认为这不符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应属于人民的说法。这个说法在那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抗日战争史的书籍和论文大多认为抗日战争史上有个战略反攻阶段。我看了很多历史资料，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没有战略反攻阶段，日本的投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战争局势决定的，其中包括中国的作战，如此等等。

我国正处在大变动的时代，在大发展的过程中，负面的东西也在滋长。若干年来，不良世风和土风的影响非常严重，道德贬值，价值判断扭曲。我们的史学家对于纠正不良世风、树立崇高的道德风尚，应负起重大的责任。同时，我也深深感到学术工作者、科学研究者，也就是我们自己，有个“净化心灵”的问题。我在多个场合谈过这个问题。下面是2000年8月14日我在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及中国现代史与西部大开发全国学术讨论会闭幕会上讲的几段话：

从事历史的传授、讲述、研究、撰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文化事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史学和史学家。任何一个重大的事物都需要从历史也需要从现实性上去说明它的来历，从而证明它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历史有预见功能，可以“鉴往知来”，探讨人类的前途、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历史。可见史学和历史研究是多么重要。所以史学工作者、史学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是非常重要而艰巨的。

同时史学工作者、史学家的责任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崇高的。许多从事史学工作的人对这一点似乎还缺乏自觉。不管是讲述历史还是撰著历史，对历史上的重大人物都要进行评说，如马、恩、列、斯、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孔、孟、老、庄、荀、韩非、朱熹、

王阳明，等等。这是十分庄重严肃的事情。此其一。其二，对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因果是非，要做出判断。叙述历史过程是为了显示出它的意义，说明它为什么为人类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历史研究必然要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道路、前途，以及怎样去实现它。当然我们研究的许多具体问题不是直接说明这些大问题的，但具体问题不能与全局问题无关。局部是全局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必须时时想着怎样给人们、给读者好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引导社会走正路，而不走邪路。所以说史学工作是非常严肃的，对这个庄严的任务我们是责无旁贷的。

史学对重大历史事件要判断是非，做出总结，对伟大人物不仅要确定功过，还要做出道义上的评价，对于大奸慝要判定他的罪行。要做到这些，史学工作者必须高出于被分析评价的对象之上，批判历史要站在时代的高峰，超越历史。如此看来，史学不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是非常崇高的事业。我们这里是从工作的性质上说的，不是说我们的地位高人一等，别的工作不如我们的工作重要。

史学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崇高的事业需要具备崇高人格的人去从事。我们从事史学工作要为人民着想，为国家民族着想，为社会发展着想。我们的工作是为“公”不是为私。史学要为人民服务，不能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更不能为邪恶做辩护。为此，史学工作者必须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净化自己的心灵。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现在不但需要人文科学，更需要一些具有人格力量的人文知识分子承担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任。”这些话对我们搞历史的人也是非常适用的。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史学家蓝达尔说：“不论是悲观主义的时代或乐观主义的时代，社会总需要历史学家。”“他——这个理想的历史学家——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或短暂的现在。他明白道理、忠诚、有信仰、尊重人类价值。……它具有防止不开明或党派性偏见的理解力。”又说：“就历史学家本身来说，我们应始终记住他的责任感、他的宗旨、他的用意和目标。完全理想的地步也许是达不到的，但理想的性质就是如此，人们很难达到它，但却以它为努力的目标。”这些话